

CC 常青藤译丛

Das Zusammenbedender Kulturen

文明的共存

——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德] 哈拉尔德·米勒 著

郗红 那滨 译



新华出版社



常青藤译丛

Das Zusammenleben der
Kulturen
文明的共存

——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德] 哈拉尔德·米勒 著

郗红 那滨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共存: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德)
米勒著; 郦红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2
(常青藤译丛)

ISBN 7-5011-5493-7

I. 文… II. ①米…②郦…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436 号
京权图字: 01-2001-0462 号

Das Zusammenleben der Kulturen

Copyright ©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8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文明的共存

——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德] 哈拉尔德·米勒 著

郦红 那滨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5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ISBN 7-5011-5493-7/G·2007 定价: 21.80 元

BAZ08/06

编者序言

《常青藤译丛》是本社推出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其名称和主旨皆受到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主体的“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 的启发。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学术盛名的联盟，该联盟致力于“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具体说来，多年来，它以追求理想的激情和探索现实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探求新思想、新事物、新价值，倡导自由探索、自由审视和自由创造。

《常青藤译丛》是一套力图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全球性的眼光推介外国前沿思想文化成果的丛书。我们将分辑出版，陆续为读者推出。第一辑共四本，它们是《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 50 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英〕约翰·雷契著、《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劳伦斯·哈里森、塞缪尔·亨廷顿主编、《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德〕哈拉尔德·米勒著、《学术责任》〔美〕唐纳德·肯尼迪著。

《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 50 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是关于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性理论的一本书。作者约翰·雷契在书中介绍了当代极具影响力的 50 位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德里达、利奥塔和卡夫卡等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各个时期思想理论及其影响，作者特在每部分前写有一个简

短的导言性评述。此书不仅是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重要参考，而且对于希望更多了解本世纪最重要的知识革命的读者来说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是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亨廷顿参与主编的一部书。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论证并阐述了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答了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由埃通加·曼格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可以说是本书点睛之笔。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的作者哈拉尔德·米勒是一位极具权威的批评家。他不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氏文明敌对论的全球观，而且向我们警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作者明确指出：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虽然国际现实政治的发展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理论的某种预见性，但哈拉尔德·米勒的理论仍然具有现实价值。我们不妨将塞缪尔·亨廷顿和哈拉尔德·米勒的看似对立的理论观点看作同一命题的合题——这样两位思想家就在智性和善性的目的上汇合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和德国学者米勒从“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世界框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关注和反思。“文明冲突”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文明共存是融合各种文明不同的特质、扬弃不合适宜文明，形成多样化的新的文明体系。文明共存中必然有文

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和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密不可分并互为前提，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

《学术责任》的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多年校长。现在仍在该校执教的唐纳德·肯尼迪无疑是著述此书的最佳人选。他以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从学术责任的高度首先阐述了如何影响未来大学，如何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的问题；其次，作者论述了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如果说，人类思想文化是智慧的结晶、进步的阶梯、文明的象征，那么上述四部著作就成为反映当代思想文化深度和成果的最好文本。

文化和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德谟克里特说：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告别了20世纪和经历了20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提出了更深层的课题，为了实现中国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此同时，还要从多类文化的宝库汲取思想文化的营养——这就是编辑出版《常青藤译丛》之目的。

前 言

1996年12月16日，我有幸与塞缪尔·亨廷顿先生就他的大作《文明的冲突》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这次活动是由法兰克福的“美国之家”组织的，辩论结束之后，菲雪尔出版社的多姆扎尔斯基先生建议我将对亨廷顿观点的不同见解整理成书出版，我当然不会拒绝这个美好的建议，其结果便是放在诸君面前的这部拙作。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原则性批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的观点在第二部分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在第一章中我比较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差异，研究了现代社会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第二章则探讨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分析了文化因素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会变成“政治问题”。第三章研究了暴力冲突的原因和进程，提出了关键的问题，即亨廷顿的设想在今天的战争中是否得到了证实。

第三部分则具体观察分析了国际政治的大地区：西方世界、亚洲、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边缘地区”。五章中的每一章都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国际政治发展趋势或是进行了设想，或是进行了预测。

本书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描述了各地区之间关系进展的前景，阐明了可以想见的“破坏因素”——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大规模移民。最后一章则从这些分析中得出适合政治运作的结论。

本书从正面反驳了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地套入“敌我对

抗”的亨氏模式，它要求读者对发生在五大洲的几乎无法预见的复杂事件尽力做出评判。作者明确指出了—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主宰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但同时它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危险敌对性有可能得以调和：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的，因此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

一部涵盖整个国际关系的著作非个人能力所及，我谨在此对所有致力于地区政治研究的专家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正是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才能对今天国际关系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外，我也想借此对黑森州和平和冲突研究基金会的同仁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延斯·贝格豪夫、金喀·格尔克和阿希姆·施潘厄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瑞莎娜·德达第、莎毕娜·菲舍尔和基尔斯滕·威斯特法尔的博士论文对我书中一些重要观点的形成也大有裨益。延斯·贝格豪夫、乌娜·贝格和斯黛芬尼·索尼乌斯在调查研究方面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当我的电脑不可避免地出现故障时，马克斯·缪尔曼就会像天使—样飞到我的身边。

我的夫人乌尔瑞克·米勒，尽管自己的工作极其繁忙，但是在我必须—吐为快时，总是乐意聆听我的倾诉，她平静地接受了我常常思想飘忽不定的现实，井然有序地处理了各种家庭琐事，使我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本书的著述中去。—如既往，她是我—最感激不尽的人。

哈拉尔德·米勒

于 1998 年 8 月

文明的共存

目 录

编者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批判

1. 亨廷顿的世界/3

第二部分 理念

1. 文化、文明、国家和社会/31
2. 社会危机和政治统治/64
3. 现代战争和冲突/84

第三部分 分析

1. 我们是谁——从“西方文明”的起源说起/111
2. “危险的黄祸？”——亚洲的崛起/137
3. 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远征军——伊斯兰的多重性/171
4. 不稳定的核大国：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204
5. 国际政治的边缘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225

第四部分 展望

1. 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对未来的展望/251

2.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280

译者后记/300

第一部分 批 判



1

亨廷顿的世界

人类总是被深深的恐惧所困扰，因为生命如此脆弱，易受伤害并且时刻受到威胁。富裕的生活、社会保险、文化保护以及自我身份，凡此种种，皆因此而起。人类需要拥有自己的身份证明，他们希望并且需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又将何去何从。确认身份表示划分界限，具有某一个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不会成为另一个人。在变革、危机和苦难的时代，这两种基本的现象汇合到了一起：随着恐惧感的增强，界限也变得愈加重要。寻找一个敌人，或是寻找一个替罪羊成为了某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则目标明确地针对那些所谓的“外人”。敌对势力是可怕的威胁，但是它们背后隐藏着一种同样可怕的东西，即对敌人的渴望，尤其当世道不好的时候。

《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缺陷中应运而生的。随着最大的敌对势力共产主义苏联的崩溃，西方政治社会的安全感较之以前有所增加，甚至感到安全了许多。他们不再受到战争的威胁，不会有核对抗直接在他们家门口发生，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安全。相反，很多事情却陷入了一片混乱，这并不是东西方对峙结束的直接后果，但它无疑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随着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和与此紧密相连的贸易、金融以及交流的不断融合和加速，也包括日益增长的

移民潮，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是以前的模样，我们的未来难以逆料，我们再不能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可恶的苏联人了。

亨廷顿文明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向我们预示了事态发展的方向：根据民族的划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推动，现在，世界历史各种文化正走向对峙，他所说的“文明”，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古代英语）中更喜欢用“文化”这个词来表达。各种文化将形成巨大的敌对集团，事实上这种对立现在也已经形成了。在地平线上，伊斯兰和儒教的联盟将直接威胁到西方社会的安全。在这里，“黄色威胁”（指西征至多瑙河流域的蒙古铁骑——译者注）和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远征军”被富有创造性地结合到了一起，而这两种势力在西方各民族共同的记忆中，都曾留下过根深蒂固的创伤。

《文明的冲突》为我们重新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实际上是在极端雄心勃勃地追求一种对世界的重新规划：它试图使我们相信，文明间的对抗正是现在和未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文化传统才是促使人们采取共同行动、形成共同思想的源头。亨廷顿对人类文明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划分，他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决定因素，包括历史渊源、价值体系、生活方式、世界观和相应的社会、政治思维方式等等的深刻剖析，绘制出一幅世界新地图；同时，以文化为尺度，设计并构想未来的世界格局。有趣的是，亨氏文化划分的基点竟是宗教信仰。鉴于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教会世俗化趋势，这可能会令人感到吃惊。但是亨廷顿先生却将这种现代社会的“无神论”趋势搁置一边，而把宗教基础看做是更为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发展趋势，这显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在这个基础上他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几大板块：

- 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
- 斯拉夫-希腊各国的东正教文化；
- 涵盖中非、中东、中亚一直到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文化；
- 非洲文化——尽管它纷乱芜杂，没有统一的表现形式；
- 印度的印度教文化；
- 日本文化；
- 中国以及其东亚、东南亚周边地区的儒教文化。

另外，拉丁美洲文化是自成体系，基本上还是属于基督教——西方文化的范畴，亨廷顿对它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

亨氏认为，西方文化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并且凭借国家和军事的优势，长期以来一直在全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他各国正在奋起直追，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迅速超越这些西方国家。亚洲会赶超欧洲，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西方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发生过剧烈碰撞，并且积怨已久。现在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遭到质疑和批判，随着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其他文化的方向转移，西方文化受到的排斥将会不断加大。

随着人口统计学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准确、快捷地洞悉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统计资料表明，反西方文化的势力正显著增强。具体表现在非西方地区人口的迅猛增长上。世界其他各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都远胜于西方国家。非洲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已达到或超过3%，在这些国家，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经济的停滞不前使这些生活无着的年轻人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丧失信念、充满失意和怨恨，不停地寻找可以发泄郁闷的对象。而宣扬反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观念，正好可以帮助

他们在生活中重新找回自我。年轻一代较之年长的父辈更具抗争性和暴力倾向。80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苏，这些偏激的年轻人找到了反对正统基督教文化的理想场所，因此很可能存在一股巨大的反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动员势力。

文化的类别一般都围绕着某个核心国家进行划分：美国及其西欧盟国自然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不管承认与否，日本的文化有其特殊性，尽管它与中国文化有许多渊源；俄罗斯是东正教文化的核心国家；印度文化圈和其国家范围是重合的；而非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则缺乏中心国家。亨廷顿或许偶尔提及土耳其有可能起到对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作用，因此假如有一天安卡拉最终决定拒绝那些雄心勃勃的欧洲伙伴，北约则应该宽宏大量地原谅这个昔日的盟友。

在亨廷顿看来，各种不同的文化都体现了所谓的“霸权意识”，尽管它们又有所区别，但都会无一例外地影响其文化范畴内的人们行为。于是，文明间的相互碰撞在所难免，冲突自然不断。现在，各种文明的交界之处正是相互摩擦、争端频繁的地区。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如波西尼亚、苏丹、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都呈现出内在的裂痕，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激烈的暴力冲突，甚至内战的爆发，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流血边境”，那里的问题更为突出。正因为此，分裂是能够促进和平的惟一选择：结束多元文化，创造纯文化的国家；停止跨越文化界限或国界的传教布道，尽管这种行为在宗教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在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许多方面，都曾取得了重大成就，譬如人权保障、政教分离以及妇女解放等等。当一种政治处于文化的结合部时，只有减轻内部各种文化间的碰撞和摩擦，才有可能阻止由此而引发的全球性冲突。

如其不然，亨廷顿认为我们将看到儒教和伊斯兰教形成的反西方同盟，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梦魇：文化间的战争，由于强烈的敌意以及冲突的多样化和突发性，很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从而最终将演变成全球性的核战争：那将会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景象，人类会因此丧失一切理想和希望，变得毫无前途可言。

出人意料的是，在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之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为文化间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辩护，这和前面章节中表达的主题迥然不同。难道这是为了引导读者自由想像而采取的策略性写作手法？抑或是实事求是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不管怎么说，迪特尔·森哈斯的评论是相当中肯的，他就事论事地指出，《文明的冲突》写的是关于“一个和解的计划，假如我们一味地按着它的思路不假思索地进行分析，那我们其实不必把这个计划太当真。”^①

世界格局与世界现实

今天的世界格局，是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世界新格局。它无疑是一种国际新秩序。我们曾经对它津津乐道，希望它会给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如同在冷战时代，我们对所谓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划分一样，今天我们对世界的划分同样也过于简单和草率。“文明”的差异固然给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但它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驱动，所以很难避免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我们很有可能像从前一样，

^① Dieter Senghaas, “《文明的冲突》中的固执观念”，摘自《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7年第2期215-221页。